

張籍集繫年校注

上册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# 張籍集繫年校注

上冊

徐禮節  
余恕誠

校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張籍集繫年校注:典藏本/(唐)張籍撰;徐禮節,余恕誠校注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6.10  
(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)  
ISBN 978-7-101-11630-4

I. 張… II. ①張…②徐…③余… III. 唐詩-注釋  
IV. I222.7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048503 號

責任編輯:李天飛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張籍集繫年校注(典藏本)

(全三冊)

[唐]張籍撰

徐禮節 余恕誠 校注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39 印張·6 插頁·900 千字

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176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1630-4

全國高校古委會古籍整理研究項目

本書爲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項目

巢湖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# 前言

中唐尤其是貞元、元和時期，是唐詩與中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。在這個階段，詩歌創作突破了自《詩經》、《楚辭》以來的傳統的審美規範，呈現出求新求變、多彩紛呈的繁榮局面，從而直接影響了其後自晚唐五代至宋詩的走向。張籍就是這個階段的一位重要詩人。

## 一

張籍，字文昌，行第十八，籍貫蘇州。約於唐代宗大曆元年（七六六）生於蘇州或和州烏江縣（治今安徽和縣烏江鎮）。十歲前後居烏江。少年時代在蘇州一帶度過。一生經歷了求學、漫游和爲官三個主要階段。

德宗建中四年（七八三），張籍十八歲，北上河北求學，與同齡的王建相互「追隨」於「鵝山漳水」一帶長達十載。其間約於貞元二年（七八六），二人同游洛陽，客寓至少半載。

此十年是張籍也是王建人生中最為重要的時期之一。一方面，二人寄居道觀、僧舍、「門館」，轉益多師，「孜孜日求益，猶恐業未博」（王建《勵學》），為後來的詩歌創作與入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另一方面，當時國家內憂外患頻仍（吐蕃侵占隴西，頻繁寇擾關隴；山東軍閥割據，內戰連綿不息），給廣大人民和社會造成了深重的災難，而河北又是藩鎮割據之地，遭安史兵燹後的洛陽也不再具有盛世陪都的繁華，這些使年輕的詩人切身地感受到戰爭的罪惡、軍閥割據的黑暗與人民的痛苦，激發起安邦定國、興利除弊的理想和抱負，因此，二人十年間創作了大量的積極干預現實的樂府詩，從而奠定了其在文學史上的顯著地位。同時，頻繁的詩藝交流與切磋，形成了共同的審美志趣，對二人的詩風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這十年的求學生活，張、王後來皆有詩追憶，如張籍云：「年狀皆齊初有髭，鵲山漳水每追隨。使君座下朝聽《易》，處士庭中夜會詩。新作句成相借問，閑求義盡共尋思。」（《逢王建有贈》）「十年為道侶，幾處共柴扉。」（《登城寄王建》）王建云：「昔歲同講道，青襟在師傍。出處兩相因，如彼衣與裳。」（《送張籍歸江東》）

貞元八年（七九二）秋，張籍學成，前往長安求薦應舉，未果。「失意未還家，馬蹄盡四方」（王建《送張籍歸江東》），次年春詩人離長安，踏上漫遊的征程。先南游鄂、湘、贛、嶺南，再北游薊北；十二年（七九六）返蘇州，隨即又南游湖州、杭州、剡谿，最後經宣州歸和

州。四年中，詩人「弊裘羸馬」（《行路難》），「四支不」寧」（《南歸》），南北奔走，主要目的是拜謁地方政要以求舉薦，這從其詩句「豈知東與西，憔悴竟無成」（《南歸》）、「薄游空感惠，失計自憐貧」（《舟行寄李湖州》）可以見出。同唐代多數詩人一樣，張籍并未取得預期的成效。但艱苦的漫游，開闊了視野，豐富了創作素材。這時期詩人大量創作羈旅行役詩和描寫風土人情的樂府詩，即直接緣於旅中的所見所聞所感；張籍詩風新奇，與其漫游四方的新奇體驗也不無關係。

貞元十三年（七九七）十月，張籍北游至汴州，偶逢韓愈，受到韓愈激賞並被「館置城西」以習古文。這是詩人人生的重要轉折點。十四年秋，韓愈知汴州試，籍得「首薦」，次年春進士及第，六年後得官入仕。要特別指出的是，張籍一生交游甚廣，其中韓愈對其人生與創作的影響至為重要，不僅科舉及第與後來的仕途晉升多得力於韓愈的相助，其蜚聲詩壇也與韓愈的稱揚有關，張籍在《祭退之》中即云：「北游偶逢公，盛語相稱明。名因天下聞，傳者人歌聲。」詩人獨特的詩風是在結識韓愈後纔逐漸成熟的，多少也有韓愈影響的因素；至於「古文」，更是直接師從韓愈。

元和元年（八〇六），張籍「依選」調補太常寺太祝（正九品上）；「十年不改舊官銜」（白居易《重到城七絕句·張十八》），至元和十一年（八一六）春纔遷國子助教（從六品

上），後歷廣文博士（正六品上）、秘書郎（從六品上）。十五年冬，韓愈薦為國子監博士（正五品上），始登朝班。再轉水部員外郎（從六品上）、主客郎中（從五品上），約於大和四年（八三〇）春終於國子司業（從四品下）。雖然張籍所任多是品位較低且清閑的職位，但相對於唐代大多數詩人來說，其仕途還算是比較平坦的，不僅不曾遭貶，甚至不曾外任地方官。總的說來，其後期的生活比較閑靜，這直接影響着其後期的詩歌創作：多寫自己貧病清靜的生活及這種生活的感受，缺乏入仕前詩歌開闊的胸襟和深廣的社會內容；以近體為主，較少入仕前的古體尤其是樂府歌行；更講求精思苦煉和新奇平淡。

## 二

唐朝思想解放，儒、佛、道相容並存，詩人很少有單獨受到或儒或道或佛一家影響的，張籍沒有例外。但同多數詩人一樣，其主導思想又始終是儒家。

張籍入仕前，儒家修身、用世的思想非常顯著。其《祭退之》云：「籍在江湖間，獨以道自將。」所謂「道」，指的就是儒家之道。貞元十二年他在《贈孟郊》中贊揚孟郊：「君生衰俗間，立身如《禮經》。」居汴期間所作《董公詩》歌頌董晉：「單車入危城，慈惠安群



凶。「不自以爲資，奉上但顛顛。」所憂在萬人，人實我寧空。「輕刑寬其政，薄賦弛租庸。」所立足的都是儒家的立身與用世準則。這種思想在其給韓愈的兩封書信中表現得尤爲鮮明。針對「浮屠之法」、「黃老之術」昌熾，「世俗陵靡」，「聖人之道廢弛」的現實，他強烈要求韓愈效法孟子、揚雄，「爲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，使時之人、後之人」「去絕異學」；認爲韓愈「尚駁雜無實之說」，「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」，「累於令德」，君子不爲，勸其絕棄二者，「弘廣以接天下之士」。張籍早期潛心苦讀，四方求薦，積極入仕，也充分表明積極用世是其思想的主導。入仕後，隨着年齡、閱歷的增加，張籍的用世思想有所消退，但儒學仍是立身之本。元稹《授張籍秘書郎制》：「以爾籍雅尚古文，不從流俗，切磨諷興，有助政經。而又居貧宴然，廉退不競。俾任石渠之職，思聞木鐸之音。」韓愈《舉薦張籍狀》：「學有師法，文多古風；沈默靜退，介然自守；聲華行實，光映儒林。」白居易《張籍可水部員外郎制》：「文教興則儒行顯，王澤流則歌詩作。若上以張教流澤爲意，則服儒業詩者，宜稍進之。頃籍自校秘文而訓國胄，今又覆名揣稱，以水曹郎處焉。」都從服儒的角度給予張籍的人品、學業以充分的肯定和褒揚。

張籍也受到佛、道思想的影響，詩中常常寫到修道和參禪。寫入仕前的生活如《憶故州》：「累石爲山伴野夫，自收靈藥讀仙書。」《寄菖蒲》：「君能來作棲霞侶，與君同人丹

玄鄉。」寫入仕後的生活如《春日李舍人宅見兩省諸公唱和因書情即事》：「官閑人事少，年長道情多。」《寒食夜寄姚侍御》：「作酒和山藥，教兒寫道書。」《題暉師影堂》：「日早欲參禪，竟無相識緣。」但佛、道的影響始終是有限的。譬如張籍就不信鬼神之說，其《閑居》云：「唯教推甲子，不信守庚申。」「守庚申」指的是道教所謂的每逢庚申日須通宵靜坐以防尸鬼競亂。他對道家「長生」之法也表示懷疑，《不食仙姑山房》云：「丹砂如可學，便欲住幽林。」在張籍看來，「丹砂」是否可學，難以肯定。又如《書懷》：「自小習成疏懶性，人間事事總無功。別從仙客求方法，時到僧家問苦空。」可見詩人是因「事事」「無功」纔「求」道「問」佛的；又因對道、佛沒有深入研究，纔不免請教「仙客」、「僧家」。張籍早期還借助樂府詩對道家的「求仙」行爲進行深刻揭露和批判，典型的如《學仙》；甚至主張「去絕」佛、道二教，這在上韓愈的兩封書信中表現得最爲鮮明。可以說，張籍之於釋、道，主要是藉以調節心性，平抑煩惱，其立身處世之本始終是強調「有爲」的儒家。

與其主導思想一致，張籍的詩學思想也具有鮮明的儒學特徵。其核心是主張復「古」，提倡「大雅」、「正聲」，也就是強調學習先秦詩歌（樂歌），發揚「風雅」傳統。其《廢瑟詞》：「千年曲譜不分明，樂府無人傳正聲。……幾時天下復古樂，此瑟重奏《雲門》曲。」明確提出要恢復先秦《雲門》一類的「樂府」、「正聲」。這裏說的是音樂，實則與詩歌

相通。王建《送張籍歸江東》：「君詩發大雅，正氣回我腸。」白居易《讀張籍古樂府》：「爲詩意如何？六義互鋪陳。風雅比興外，未嘗著空文。」都指出張籍崇尚「大雅」、「六義」。這種詩學觀是與陳子昂、李白、沈千運、元結等一脈相承的。當然，受時代思潮的影響，張籍也主張創「新」。他在《與韓愈書》中就反對「守章句之學，因循於時」；其《送辛少府任樂安》云「才多不肯浪容身，老大詩章轉更新」，對辛少府詩藝上的不斷創「新」，給予高度贊揚。要之，張籍是主張寓「變」於「復」，在「復」中求「變」。其創作大量的反映現實、諷刺時弊的「新題」樂府，詩風呈現「平淡」、「新奇」的特徵，都是這種詩學思想在創作中的具體體現。

也由於儒家思想的主導作用，張籍爲人端正持重，介然自守，前引元、白的兩篇制文與韓愈的薦舉狀對此都有明確的評定。兩《唐書》、《唐才子傳》所謂張籍「性詭激」、「性狷直」，未免有不實之嫌。這種品格也是張籍詩風平淡、後期能長期居京爲官而不曾卷入政治風波的主要因素之一。

## 三

張籍以樂府詩著稱，後世將其與王建並稱為「張王」。其樂府當大多創作於入仕之前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徵和成就。

一、發揚《詩經》、漢樂府「感於哀樂，緣事而發」的現實主義傳統，廣泛而深刻地揭示社會弊端和民生疾苦，具有強烈的諷諭性。中唐時期吐蕃入侵、藩鎮叛亂、佛道昌熾、土地兼併、統治者腐朽糜爛、世風澆薄，以及種種封建剝削、壓迫等社會問題及其給廣大百姓造成的災難和痛苦，張籍樂府有全面、深刻而生動的反映。如《隴頭行》、《西州》、《築城詞》、《野老歌》、《猛虎行》、《學仙》、《離婦》等都是這方面的名篇。

二、美教化，厚人倫，移風俗，具有鮮明的風教性。如《董公詩》頌揚董晉臨危受命，治亂有方；《將軍行》贊美將軍的報國精神與驅敵戰功；《江陵孝女》歌頌孝女的孝行孝道，都非常典型。上述兩方面，白居易《讀張籍古樂府》曾給予高度評價：「讀君《學仙》詩，可諷放佚君。讀君《董公詩》，可誨貪暴臣。讀君《商女》詩，可感悍婦仁。讀君《勤齊》詩，可勸薄夫敦。上可裨教化，舒之濟萬民。下可理情性，卷之善一身。」

三、廣泛反映百姓的現實生活尤其是風土人情。如《少年行》寫少年英雄殺敵報國，《烏啼引》寫囚吏之妻盼夫遇赦，《各東西》寫朋友離別，《白紵歌》寫少婦爲夫裁製春衣，《採蓮曲》寫少女採蓮，《江南曲》寫江南水鄉風土等等，都是廣大平民生活與情感、願望的生動寫照。明胡震亨云「張文昌只得就世俗俚淺事做題目」（《唐音癸籤》卷九），宋張戒云「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」（《歲寒堂詩話》卷上），指出的就是這方面的特徵。

四、學習古樂府民歌，多采用民歌的語言和表現手法，具有「古質」的特徵。這是「張王」樂府區別於唐代多數文人樂府的主要所在。宋曾季狸即云：「唐人樂府，惟張籍、王建古質。」（《艇齋詩話》）明高棅亦云：「大曆以還，古聲愈下，獨張籍、王建二家體制相似，稍復古意。或舊曲新聲，或新題古義，詞旨通暢，悲歡窮泰，慨然有古歌謠之遺風。」（《唐詩品彙·七言古詩叙目》）正因爲這些特徵和成就，張籍樂府受到時人和後世的很高評價。如白居易云：「尤工樂府詩，舉代少其倫。」（《讀張籍古樂府》）元辛文房云：「（籍）於樂府古風，與王司馬自成機軸，絕世獨立。」（《唐才子傳·張籍》）清李調元云：「王建、張籍樂府……與漢、魏樂府並傳。」（《雨村詩話》卷下）宋周紫芝甚至認爲「唐人作樂府者甚多，當以張文昌爲第一」（《竹坡詩話》）。

張籍詩歌創作衆體兼善，律詩成就也很高，尤其是五律。南唐張洎曾云：「（籍）長於

今體律詩，貞元已前，作者間出，大抵互相祖尚，拘於常態，迨公一變，而章句之妙，冠於流品矣！」（《張司業集序》）清管世銘認為元和七律，柳宗元與劉禹錫為「二豪」，「其次則張水部，風流蘊藉，不失雅音」（《讀雪山房唐詩序例·七律凡例》）明唐汝詢評其五律：「籍詩意遠，語若天成。就一體論，元和間堪執牛耳。」（明周珣輯《刪補唐詩選脉箋釋會通評林·五言律詩》卷三四引）清潘德輿同樣認為：「文昌……五律清妙處不亞王、孟。」（《養一齋詩話》卷二）。張籍律詩在題材和氣格上的主要特徵是收斂，這與「大曆」是一脈相承的。清賀裳即云：「盛唐人無不高凝整渾，隨州短律，始收斂氣力，歸于自然，首尾一氣，宛若面語。其後遂流為張籍一派，益事流走，景不越于目前，情不踰于人我，無復高足闊步，包括宇宙，綜攬人物之意。」（《載酒園詩話又編》「劉長卿」條）清喬億亦云：「陳、杜、沈、宋、二張（燕公、曲江）、王、孟、高、岑、李、杜及劉、韋、錢、郎諸家五律，雖氣有厚薄，骨有輕重，並入高品，後來惟張文昌稍步趨大曆。」（《劍谿說詩》卷下）張籍律詩的藝術特徵主要表現為「字清」、「意遠」、「平淡」。如南唐張洎云：「張水部為律格詩，尤工於匠物，字清意遠，不涉舊體，天下莫能窺其奧。」（《項斯詩集序》）清賀裳云：「司業律詩以淺淡而妙。」（《載酒園詩話又編》「張籍王建」條）當然，因為體制不同，張籍的五、七律也有差異，誠如宋劉攽所言：「張籍……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，至七言則質多文少。」（《中山詩

話》張籍五律對中晚唐詩歌的影響是深遠的，對此，南唐張洎早已論及：「張水部爲律格詩……唯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。沿流而下，則有任蕃、陳標、章孝標、倪勝、司空圖等，咸及門焉。」（《項斯詩集序》）後來元人方回、明人楊慎、清人李懷民皆認爲晚唐詩分兩派，一派張籍，一派賈島。明許學夷也說：「張王五言清新峭拔……爲另一種，五代諸公多出此矣。」（《詩源辯體》卷二七）

張籍的絕句同樣優秀，清田雯評其七絕就指出：「標致悠閒，宛轉流暢，如天衣無縫，鍼鏤莫尋。」（《古歡堂雜著》卷二「論七言絕句」條）

張籍的詩風可以概括爲「平淡新奇」。對此，古人多有評述，如：

張籍學古淡，軒鶴避雞群。（唐韓愈《醉贈張秘書》）

古風無手敵，新語是人知。（唐姚合《贈張籍太祝》）

張籍盧仝鬪新怪，最稱東野爲奇瑰。（宋梅堯臣《依韻和永叔澄心堂紙答劉原甫》）

看似尋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卻艱辛。（宋王安石《題張司業詩》）

司業之詩新而奇。（明劉成德《唐司業張籍詩集序》）

晚唐張爲《詩人主客圖》將張籍列爲「清奇雅正主」李益之人室，也是基於這種詩風的考慮。可見，張籍與當時的韓、白兩派的詩風是有所不同的，簡單地將其劃歸韓派或白派

都是不太恰當的。

張籍還擅長古文，韓愈曾稱「其文與（李）翱相上下」（《與馮宿論文書》），惜作品佚失殆盡，今唯存上韓愈二書，無從知其全貌。

#### 四

張籍卒時作品尚未結集，無可《哭張籍司業》：「樂章誰與集，壠樹即堪攀。」五代時文集已行世，因戰亂散佚。南唐張洎《張司業集序》即云：「自皇朝多故，薦經離亂，公之遺集，十不存一。」今知最早的張籍集為張洎所編，其《序》云：「予自丙午歲（九四六）迨至乙丑歲（九六五），相次緝綴，僅得四百餘篇，藏諸篋笥，餘則更俟博訪，以廣其遺闕云爾。」洎所編有兩本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（卷一七）：「《張籍詩集》五卷。……張洎為之編次。」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（卷一九）：「《木鐸集》十二卷。張洎所編。錢公輔名《木鐸集》。」知一為「五卷」本，一為「十二卷」本。何以有兩本，余嘉錫先生云：「是洎原欲陸續搜訪以求完善，故其所編，遂有數本，其作五卷或三卷者，初編之本也，蓋即乾德乙丑以前所綴輯；其作十二卷者，續編之本也，所謂『博訪以廣遺闕』者，後為錢公輔所得，名之為



《木鐸集》，以別於他本，非張洎所自名也。」（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卷二〇）或是。關於錢公輔更名《木鐸集》之「十二卷」本，南宋魏峻刻《張司業詩集》附拾遺詩跋載：「『木鐸』者，司業詩之別名也。前國子監書庫官張元龍震發得於故家，張氏問其由來，則皇祐三年（一〇五一）舍人毗陵錢公輔通守越郡時，得於太守楊君，云張洎家本也。視他本最完。」《宋史·藝文志》（卷二〇八）所載《張籍集》十二卷「當即《木鐸集》」。

除張洎所編二本外，宋代尚有「七卷本」、「湯氏元豐本」、「歷陽本」、「盱江本」、「平江八卷本」、「蜀刻本」、「書棚三卷本」。

「七卷本」，為北宋館閣所藏本，《崇文總目》（卷一一）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（卷六〇）、《通志·藝文略》（卷七〇）均載，今失傳。余嘉錫《四庫提要辨證》（卷二〇）：「此不知何人所編，疑在張洎之前。」明高儒《百川書志》（卷一四）：「《張司業集》七卷。……今併一冊，卷數仍舊。」未知是否此「七卷本」。

「平江八卷本」，南宋末番陽湯中（季庸）校定，魏峻（叔高）刻於平江（蘇州）。湯中《序》：「張司業詩集，世所傳者，歷陽、盱江二本爾，編次不倫，字亦多誤。余家藏元豐八年（一〇八五）寫本，以樂府首卷，絕句繫後，既有條理，其間古詩亦多二本十數首。……今合三本校定為八卷，共四百二十六首。」魏峻附拾遺詩跋：「右五詩見《木鐸集》。『木